

焦点关注

山西太原推广实施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新模式

“五色”预警织密妇女权益保护网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吃完早饭,晓琳像往常一样,准备去社区的几位独居老人家中看看是否需要帮忙。没走几步,她就看到前边不远处,一名年轻女子在马路边低声抽泣,口中还不时诅咒几句。晓琳是太原市小店区的一名社区网格员,社区大大小小的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职业敏感告诉她,年轻女子一定是遇到了难事。晓琳表明身份后,并没有急于刨根问底,而是与其拉起了家常,还向她征求起了最近小区改造自来水管网的意见。很快,对方的情绪得到平复,在晓琳的引导下,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家丑”。

按“色”调处,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女子名叫张华(化名),是刚搬来小区的一名住户。张华和丈夫刘某都来自山西的一个小县城,几年前,夫妻二人一起来到太原打工。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两人的收入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夫妻之间的争吵也多了起来。前不久,张华发现丈夫晚上回来得很晚,但每次问到细节,丈夫总是闪烁其词,这更增加了张华的疑心。

当天清早,张华无意中在丈夫的手机中发现了他和一个女人略带暧昧的聊天记录,两人因此发生了争吵,丈夫刘某还动手打了张华。“打了我两拳,还踢了我两脚。”一气之下,张华准备买票坐车回老家。

晓琳从张华的口中得知,刘某脾气不好,平时夫妻之间发生争吵经常会动手打她。为了给年幼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张华选择了忍让,但忍让并没有换来丈夫的理解,而是更加频繁的家暴。

在了解到张华的情况后,晓琳与社区妇联干部进行了电话沟通,并在第一时间按照“五色”分级预警机制,将事件进行整理后,上传至“太原综治信息平台”。

“太原综治信息平台”是覆盖太原市所有县区的跨部门协同运转和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平台。全市综合治理相关部门及105个街道(乡镇)和1477个村(社区)正在处理中的社会治安、城市管理各类事件都会在平台上实时更新。在这个平台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被单独列类,并作为网格员入户走访、排查报告的重要内容。妇联则作为该类别的主要责任单位,由具体的基层妇联全程跟进案件办理,并实时将处理进度在平台上更新。在张华家暴案件中,晓琳将相关信息上

“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工作方法,就是由各级政法委牵头,妇联、民政、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等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分为绿色(轻微)、蓝色(一般)、黄色(较大)、橙色(重大)、红色(特别重大)五级,进行科学研判和处置。目前已形成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联动联创的工作新格局,探索出了一条有效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路径,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充分认可。

传,并按照婚姻家庭纠纷“五色”分级预警机制将其标注为“黄色”。

自此,一套由妇联主导,社区、公安、司法以及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参与的婚姻家庭纠纷预警处置联动机制正式启动。

收到晓琳的案情通报后,社区妇联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将案情通报给辖区民警,辖区民警随即面对面向张华进行沟通了解,在确认家暴细节后,辖区民警通知张华的丈夫刘某到派出所接受处理。

“不就是夫妻吵架嘛,只是偶尔急了才会动手。”在辖区派出所,从小见惯了父母吵架,打架的刘某并不认为“打老婆”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针对刘某的情况,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告知其家暴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并对其下达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我确实没认识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经过社区干部和妇联工作人员两个多小时的法律法规宣讲和调解,刘某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以后有事好好沟通商量,不会再动手,张华也表示希望和刘某好好过日子。

考虑到刘某有多次家暴的情形,虽然保证不会再动手,但思想上的转变还不够彻底,市妇联、派出所、社区、市婚协随后组成调解小组,再次上门进行了调解和心理疏导。通过疏导,张华及其丈夫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转变,刘某真正认识到“打骂不解决问题,沟通才能让家庭变得更好”。与此同时,在社区的帮助下,张华还找到了新的工作。

“家和万事兴,我们在调解过程中还向他们夫妻双方讲解了创建文明家庭、好家庭的一些细则,全家人也都很认可。”首先上报案件的网格员晓琳全程参与了此次调处。调解初步成功后,社区和妇联干部对张华夫妇进行了定期的电话和上门回访。回访结果显示,两人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在最近的一次回访中,刘某告诉到访妇联干部,现在,他们夫妻很少争吵,家庭氛围明显好了,孩子也变得开朗多了,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

“五色”分级联动,让“家务事”不再难断

“五色”分级预警处置,是山西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实施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新模式。张华遭受家暴事件,正是通过这一模式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一个成功案例。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9年,山西省在阳泉市试点婚姻家庭矛盾调解“五色”分级预警处置模式,2021年这一模式在全省推广。

“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工作方法,由各级政法委牵头,妇联、民政、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等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目前已形成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联动联创的工作新格局,探索出了一条有效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路径,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充分认可。

“五色”,就是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分为绿色(轻微)、蓝色(一般)、黄色(较大)、橙色(重大)、红色(特别重大)五级,进行科学研判和处置。每个级别都有不同的处置程序和处置办法。”晓琳告诉记者,之所以把张华遭受家暴事件列为“黄色”,是因为按照分类规则属于“较大”级别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据太原市妇联负责人介绍,在“五色”分级中,绿色、蓝色、黄色是级别相对较低的矛盾纠纷,可采取逐级委派调处的方式,委派至相应级别调处或会同同级人民调解组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处理。调处成功的,完善相关档案资料,做好归档上报工作;调处不成功的,上升为上一级别调处解决。而橙色、红色级别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大多属于不适宜开展或不能劝和或调解的,需要第一时间上报至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上报市级平安建设矛盾纠纷专项组,在专项组的指导下,会同市级婚调委、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进行综合调处。

“五色”分级预警处置机制对不同级别的矛盾纠纷制定了具体可行的处置办法。

绿色级别,多为家庭成员的意见分歧,且当事人比较理性平和,未出现暴力行为,相对应的处置办法是进行耐心细致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讲解,并发放婚姻家庭知识手册,开展家庭美德教育。

蓝色级别中,对婆媳或夫妻等关系不和的,主动上门做好调解;对贫困、残疾、留守、流动妇女儿童和单亲、失亲、矛盾多的家庭,以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困难为主。

“张华家暴案件,属于黄色级别。这一级别的纠纷大多涉及配偶外遇、离婚投诉、遗产继承纠纷等问题,需要由相关部门进行综合调处。”晓琳提到在处置张华案时,考虑到其虽然不是初次遭受家暴,但情节相对较轻。“按照‘黄色’家庭矛盾纠纷处理程序,需要为受害人及其家庭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婚姻家庭关系指导、困难帮扶,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依法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

橙色级别,一般已造成人身伤害或具有现实危险性,妇联组织可协助受害人反映诉求,进行伤情鉴定,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开展法律帮助、心理疏导和庇护救助等。

红色级别,属于高危致命危险的婚姻家庭暴力投诉,甚至有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并导致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此类纠纷应第一时间报告公安机关,并逐级上报至市平安建设矛盾纠纷专项组,在专项组的指导下,妇联组织配合下,会同市级婚调委、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进行综合调处。

明晰的处置程序,以及包括政法委、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的参与,让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有了可以遵循的依据,也让妇联在处置家庭矛盾纠纷时有了“抓手”,更有力度。

“近年来,由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如何从源头抓好预防治理工作,不仅是妇联的工作职责所在,也是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太原市妇联负责人表示,“五色”分级预警处置,最大限度发挥了妇联的“联”优势,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市妇联已招募66名公检法和律师行业代表,组建了巾帼法律志愿者联盟,线上线下开展宣传和咨询服务,并在社区试点打造‘家事联动调解室’,由司法局派员入驻。通过发挥社区工作者、巾帼网格员作用,努力将工作触角向基层网格、家庭单元延伸,力求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维权人物

「护童天使」刘莹

为了孩子,她的脚步一刻不会停歇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与刘莹通话时,她正在组织一个夏令营的开幕活动,“参与夏令营的是一些涉案孩子,半军事化的训练主要是为了规范培养良好的习惯。”电话那头,刘莹的语速很快。虽然离开家乡吉林已10多年,但刘莹东北口音的辨识度还是很高。在匆匆聊了几句后,她急促地回复记者,“孩子们这边有很多事,我要去忙,采访回头再约。”

作为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室主任,刘莹在当地有“护童天使”的美誉,她和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刘莹姐姐工作室”在关爱未成年人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令人动容。刘莹的性格中有着倔强不肯服输的因子。在检察系统,刘莹以“能打抗撞”出名,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学体育或者警校毕业。2011年,刘莹来到检察院工作,当她带着满腔热忱去上班时,却发现学中文专业的自己和司法干警要求的“体能过硬、技能过硬、业务过硬”一点不搭边,她曾自嘲“除了‘热情过硬’啥都没有”。但她从零开始,勤学苦练,很快成长为工作的行家里手。

刘莹的大部分工作是面对大量的案件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经历多了,复杂的案子她也能从容应对,但唯独涉涉案的未成年人在时,会忍不住叹息“如果我是那个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

刘莹记得有一次在配合同事办理一起未成年入案案件时,接触到一个小被侵害的小女孩。面对检察官的询问,小女孩脸都憋红了,就是不开口。沉默良久后,小女孩哭着说,“姐姐,我不知道身体那个部位叫什么?”当时,她感到心里强烈的疼痛,这个孩子的表现正是儿童性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缺失的一个缩影。

“每当想起我们去到受害孩子的家中,小孩子躲起来又偷偷开一条门缝看我们的眼神,孩子母亲哭得声嘶力竭的绝望神情,那一刻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做点事。”刘莹说。

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号检察建议”,预防未成年人人性侵害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也是在当月,乐安县检察院党组将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的任务交给刘莹。

本就准备主动请缨的她,开始认真学习,翻阅未成年人保护法、查找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课件、看典型案例分析,看全国各地未成年人保护经验做法,和未成年人检察科的同事们翻阅往年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卷宗,进社区、进村组、进学校开展调研、座谈,掌握实际情况……此后的一年多,刘莹的脚步一刻都没有停下来。

“无论是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还是一名女性、一位母亲,我都必须去做并且尽全力做好这件事情。”刘莹和志愿者一起,连续奋战,将一年多开展法治教育的心得形成工作总结,调取近三年本地涉未案件形成调研报告。两份材料对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等进行全面分析,摸清了全县未成人人群体数量、男女比例、城乡分布、留守儿童状况等翔实数据,并建议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保护未成年人。

建议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2020年8月4日,“刘莹姐姐工作室”应运而生。这支由3000余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政府、网络、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网。

“刘莹姐姐工作室”成立后,为了让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儿童自护知识,她们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成歌谣,还创新编排了唱跳结合的防性侵自护操,“宝宝有个小肚肚,上上下下要保护。如果有人向上摸,大声说出‘不不不’……”目前,在家长的强烈建议下,这套儿童自护操已经作为当地低龄段孩子课间操的一部分。

刘莹和她的团队通过线上培训、线下宣讲、网络直播、送戏下乡、支教等活动,积极为保护未成年人发声,截至目前走遍了全县200个行政村(社区),181所学校,开展各类法治宣讲1100余场次,覆盖了全县31万人次,依法办理未成年人人性侵害案件和司法救助案件多起,帮教和心理辅导260余人。最高检先后两次全程直播报道工作室工作纪实,相关微博阅读量近6000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播报

检察机关促进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打击治理

上半年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6.4万人

新华社记者 刘奕湛

记者24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6.4万人,有力促进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打击治理。

据了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帮凶”。

从发案数量看,今年以来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量持续下降,但整体仍在高位运行。2020年10月“断卡”行动以来,起诉人数直线增加,尤其是2021年逐月上升,共起诉近13万人。案件量上涨与“断卡”行动

中执法司法机关加大对非法买卖“两卡”(即银行卡、电话卡)行为的打击力度密切相关。

从起诉人员看,涉及地区范围广,多数系初犯。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起诉的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份,特别是在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重点地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起诉人数也相对较多。

从行为方式看,组织化模式较为常见,分工细化的特征突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实施,如“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分工相对明确,便于持续性、规模化上游犯罪提供技术支持。

据悉,2020年10月“断卡”行动以来,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上涨较快,目前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3的罪名,前两位分别是危险驾驶罪、盗窃罪。



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一起做游戏。

暑期,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江西省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罗亭镇义坪小学参加“童心港湾”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活动通过组织绘画比赛、趣味游戏、助教课堂、志愿陪伴等环节,把爱心播撒到农村留守儿童心中。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

「童心港湾」关爱留守儿童



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一起绘制风筝。